

## 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

王若茜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日本宗教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的, 此后近 50 年间, 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扩张, 极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 开展“海外开教”活动, 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 随着日本军事侵略而传来的日本宗教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类派别, 由于带有明确的侵略目的, 强迫中国民众改变传统观念信仰, 使中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 因而, 无法真正融合于中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随着日本战败, 日本宗教也在东北地区荡然无存。了解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 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 以及日伪政权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行为, 有助于我国对东北殖民地文化的这段历史的了解, 并且能够进一步揭示日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警示后人。

**关键词:** 东北沦陷时期; 日本宗教; 神道体制; 侵略性

**中图分类号:** K26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34(2002)01-0110-06

### 日本宗教的传人

日本宗教传入东北地区, 是在 1904 年至 1905 年日俄战争时期。以“军队布教”的方式, 随日军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最初以佛教、日本神道教为主, 后来逐渐加入基督教、天主教等派别。“军队布教”有两种方式, 分为慰问布教和随军布教。慰问布教前往军队驻地, 宣讲佛法、教义和赠送慰问物品。随军布教则是教团派遣教使与前线军队共同行动, 向前线士兵宣教及配合军队从事其它活动。这些教使在大连、辽阳、沈阳、铁岭等地当时日本占领部队驻地各处设置临时慰问部开展活动。

随军教使的使命, 曾经在日俄战争中, 1904 年 2 月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发布《随军

**收稿日期:** 2001-08-08

**作者简介:** 王若茜 (1954-), 女, 辽宁辽阳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

教使条例（10条）》，规定了随军教使的任务及布教工作内容。其中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是布教的工作重点。第四条规定：（1）向军人士兵和随军人员进行讲经说法；（2）对死者举行追悼佛事；（3）对伤员进行抚慰；（4）除上述规定外，总部特殊命令事项或所属司令官及有关部队委托事项必须执行。第六条规定：讲经说教必须依照本宗义，进行精神安慰，鼓励义勇思想。第十条规定：随军教使必须记日记，从任命之日直至复归日止，每周向总部提交日记进行汇报，如有重要事情，应单独提出，另行报告。这就是说，随军教使的工作任务不仅要进行精神安慰和鼓励义勇思想，并且还要参与收集情报，刺探军情等间谍勾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宗教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据日本满铁总局情报课编写的《满洲宗教志》里确切记载：1904年2月佛教真宗本愿寺派一百多名随军教使在各师团等重要部队，鼓舞士气，慰问伤员，祭奠战亡者等活动，同年4月本愿寺派教主大谷尊由师亲自到达中国东北，到前线部队巡教。1904年8月在大连设立了关东别院。这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日本宗教活动据点的最早记录。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随军传教使团各种教派在大连、辽阳、铁岭等地的临时慰问部被保留下来，一部分教使也居住下来。最初滞留东北的日本教使只从事居住当地的日本人的布教。

葬礼等宗教活动。日本政府根据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策划建立中国的据点，开始在中国东北亚地区实施殖民文化政策，于是，日本政府批准了宗教各教各派组成的大批随军布教使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使日本宗教刮起了“海外开教”的风潮。1905年11月日本神道教设立了最早的安东（今丹东，下同，不再另注）神社。其后，相继在1908年建立了千山神社，1909年11月日本神道教设立了最早的安东神社。其后，相继在1908年建立了千山神社，1909年建立了抚顺神社和辽阳神社。许多神社相继建立。1915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确定了侵华体制。继而从1904年至1915年间，不断增加了长春、沈阳等九座神社。日本佛教在1904年至1914年间，建立大小寺院二十余处。日本基督教各派，在日俄战争之时，业已在军队里设立了随军传教所，1905年4月建立了基督教堂。日本的天主公教会（天主教），在此期间先后在大连、安东、抚顺、四平、长春、沈阳等地成立了以日本信徒为主的教会。

随着日本军事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不断蚕食，日本宗教也相继向东北各地扩展。当时神道教天理教派势力扩展是最为显著的，在1909年由鹤殿等人在长春设立神社教会，两年后，并在大连、安东等地设立了神社教会，并逐渐扩大到东北各地。天理教信徒人数占据最多，在沈阳、长春、吉林市等地还有长期居住的日本传道人。1929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满地区开始了侵略扩张，天理教也向哈尔滨市俄罗斯人中扩展教势。

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断地侵占，日本经济势力随之也在不断扩张，满洲铁路的建设，派往铁路沿线的日本人急剧增加，日本宗教也纷纷在铁路沿线的日本人中设立了许多神社、日式寺院和教会，形成了大批正式的宗教活动据点。作为日本宗教特点之一，日式寺庙和教堂少部分具有一定的形式规格，而大多不甚讲究，外观没有明显的寺庙、教会特征，多于一般民宅或住房中设置所供奉的神象、香炉之类简单的宗教器物，而且

大多面向来华的日本信徒传教布道。从 1904 年日俄战争起到 1945 年日本战败前，神社总数多达 290 座；日式寺院数近 380 座；日本教会数达 116 个。关于这里提出的数据，根据所掌握的文献，是不包括佛教、基督教在满铁沿线的日本居民和内地农村的开拓团中的数据，那些地方还有相当数量的佛寺、教会。

日本宗教活动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对外显示宗教对国家的忠诚，对内承担提高僧侣门徒的报国精神而发挥作用。因此，日本宗教的传入，与侵略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宗教派别

进入东北地区的日本宗教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派别。神道教是日本作为多种原始祭祀而生成的民族宗教，它与日本民间神话信仰密切相关，由一个氏族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上升为日本民族的最高神。随着日本古代朝廷统治的扩张，天照大神便被确定为“惟神之道”的国家宗教，并且还拥有数目众多的宗教派别。其中分为神社神道和宗派神道两大宗派。宗派神道教里还分：神道本局、黑住、天理、金光、御狱、楔、大社、扶桑、大成、实行、修行、神理、神习、产灵等派别。宗派神道教中的出云大社教是最先在东北地区传道的教派。1906 年 6 月随军教使松山一三在大连建立了大社教神社。此后，御狱教相继在大连由随军教使松原氏设立了御狱教神社。金光教于 1907 年 10 月由随军教使松川成三在大连建立金光教神社。天理教、黑住教等等其它派别也在此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了神社。其中，天理教的宗教势力最为强大，各地神社的设立、教徒人数之多，是神道教中之首。天理教不仅在日本人中活动，而且还向朝鲜人、中国人中传道。这是日本宗教少有的现象。“九·一八”事变后，天理教随着日伪政权的成立，在哈尔滨市郊外开拓并经营了以天理教信徒为主的一座天理教村庄。位于哈尔滨市十余公里的福昌号、城子、新立屯等三个自然村落。强行低价收购耕作土地，驱逐当地的苦不堪言的农民，迁进了大量日本移民。日伪政权称之为“北满洲日本移民村最成功之例”。日本国内也誉为“是宗教团体所做出令人注目的移民事业”。这是日本宗教为其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服务的典型事例。

日本佛教分为 13 宗 28 派，其中 12 个宗教派别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有真宗、净土宗、真言宗、日莲宗、禅宗等宗派。而且各宗派中还有小派别，如：真宗分为本派、大谷派、兴正派别等，而且真宗大谷派内部从大和尚到小和尚共划分 13 个阶层。净土宗分为镇西、知恩院两派，从大和尚到小沙弥共划分 11 个阶层。真言宗有高野、醍醐、御室等 3 派，从大僧到小沙弥共划分 15 个阶层。日莲宗分为日莲、法华、本门佛立讲、显本法华、日本山等多个派别，僧侣到小沙弥共划分 14 个阶层。禅宗分为曹洞宗和临济宗两派。

日本基督教各派中是以日本人布教为主的教派，其中有日本基督教、组合基督教、圣公会、梅斯契斯特教会、浸礼教会、救世军、包利内斯教会（两派）等，其它是以当地人布教为主的基督新教派，有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两教会，是从 1904 年以前开始布教的。而丁抹路教会从数十年前在旅大地区即辽东三角地带（大孤山方面）以及安奉铁路沿线开始布教活动。基督新教从日本方面派遣传教士与其它教派相比是非常少的，大

体区分为牧师和传教士两个阶层，然而多数教派并不派遣传教士，大多数只有牧师、司牧信徒。

基督教派救世军，内部分为将校和下士两个级别，将校级别内又分为将、佐、校、尉四级别，如同军队模式，如：小校、中校、大校、小佐、中佐、大佐等。圣公教会内部分为监督、老、执事、传教士等4个阶层。救世军是1910年在大连设立了小队而开始布教的。包利内斯教派1917年在抚顺、安东、沈阳设立了传教所，梅斯契斯特教会1919年则派遣木原牧师在大连设立了教会。

日本天主公教会（天主教）进入东北地区后，先后在大连、安东、抚顺、四平、新京（长春）、奉天（沈阳）等地建立了以日本信徒为主的教会，还有教会所属的学校等活动。

### 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活动

1938年8月日本在国内举办“宗教团体对华布教协议会”，会议上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向各宗教代表规定了工作方向：“布教工作应抓住一切机会，充分理解政府对华的意图，满洲事变之机遇，中国东北将是日本帝国必进之路，……”日本宗教早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策为其重点开展宗教活动。而且，“凡布教者赴进中国，必须向文部省提交申请书，经宗教局推荐，委派到当地军队特务部，听从指挥”。此外，还指示“对于过去一直在中国从事布教使，根据情况，可能令其离境归国。在社会事业与宗教布教之间，则以社会事业为主，布教工作为辅。”换言之，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宗教的一切活动，都应以强化殖民统治需要，置于军部的指挥和统制之下，推行“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宣抚活动。所指的社会事业，是以中国人为宣抚对象的，主要从事开办殖民地的日本化教育学校、制作各种宣扬日本化影片、散布皇民化主张的小册子等等。在佛教本派的《中国事变本派奉公记要》中曾记载：“向占领地区之民众阐述帝国之理想，纠正其以往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合作者。完成此项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出师目的。”1942年日本基督教团战时指针的实践要旨要求：“努力培养忠君爱国的精神，以使信徒成为灭私奉公的实践者，必须重视敬神崇祖的国粹，以竭尽报本返始之诚……”，并发表了一封《致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基督教徒的信》，呼吁他们对“大东亚战争进行全面合作”。日本的基督教团而且也开始恭恭敬敬参拜了伊势神宫，以示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合作态度。1944年9月，日本神道、佛教和基督教的30万名信徒联合成立了“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团”，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之中。显而易见，日本宗教的活动完全是为日本军事侵略扩张而输出的组成部分，所谓的建学校、制作影报等等宣抚行为都具有明确的文化侵略含义。特别是日本布教使自觉地与本国政府相勾结，甘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在中国东北历史上记下了黑暗的一页。

1940年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长春南郊）建立了特殊的神社。即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建国神庙是把日本传统的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之神进行国家祭祀，确立日军惟神之道为殖民地文化之根本，居“伪满洲国”众神社之首。而建国忠灵庙则作为建国神庙的摄庙而建立的。它为“伪满洲国”建立而战亡病死的2.4万名侵略者及民族汉奸的“英灵”合葬拜奠而建立的神社，借以体现所谓的“五族协和”精

神。成为日本实现殖民文化统治的重要标志。而且，日伪政权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置于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的被祭祀的位置上。根据创建目的和性质，建国神庙可视为日本的伊势神宫，而建国忠灵庙则相当于日本的靖国神社。拥有被祭祀的溥仪，被关东军迫使前往日本东京，按照日本特使吉冈要求，向日本天皇裕仁提出：“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的不可分割关系，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奉祀。”并接受了日本天皇给与的象征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即：剑、镜、玉。开始在伪满洲国担负着相当于日本天皇的使命，从而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文化的神道体制。可是，傀儡皇帝溥仪却没有像日本天皇那样被神化，而“伪满洲国”的神道体制又是被置于日本天皇的神威之下的。

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的建立，标志着“伪满洲国”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宗教等级组织。在日本国内，国家级的有伊势神宫和靖国神社，置于金字塔的顶部，其下的都、道、府、县一级有护国神社，从1939年以后，每县一座，町、村一级建立忠灵塔和忠灵碑，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宗教组织。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是以傀儡皇帝溥仪为祭祀的神社，居神社顶端，其下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大中规模的神社，如：新京神社、奉天神社、大连神社等等。再下层，修建“开拓团”的神社和忠灵塔。形成了同日本一样的金字塔式的宗教组织化。并且在各个级别上强迫中国东北民众崇敬日本国家神道教。

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的建立，是日本进一步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将日本国家神道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罪行。沉重的压迫遭到中国东北民众的极大的抵触和反抗，因此，日伪政权制定了有关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的《不敬罪处罚法》。凡对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持不敬态度者，均定为有罪。并且具体制定“对建国忠灵庙不敬行为者，处7年以下徒刑”。殖民统治的宗教法规，使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压下不堪其苦的东北民众雪上加霜。

1940年9月，日伪政权公布了《建国神庙祭祀令》，规定伪满皇帝的“亲祭”制度，每月15日由溥仪亲拜，伪官吏、伪军以及学生和市民皆要祭拜。若有日军打胜仗等消息，日本特使吉冈便敦促溥仪去神庙祭拜，以示天照大神保佑了皇军的胜利。对于“建国忠灵庙”的祭拜，规定为每年举行三次“定例祭祀”，而且还有临时祭祀。同时，日伪政权还强迫“伪满洲国”的国民，每日清晨8时，首先向日本东京方向进行“宫城遥拜”，之后向伪皇帝溥仪的宫廷进行“宫廷遥拜”。建国神庙修建在伪皇帝溥仪的宫廷旁，通过宫廷遥拜神社和忠灵庙，如有拒绝和反抗，轻者遭到开除处分，重者则处刑杀戮。另外，在朝会的遥拜之后，要求朗读国民训。所谓的国民训，第一条是“国民应读建国之渊源发自惟神之道，致崇敬的天照大神，尽忠诚于天皇陛下”，共五条，勒令进行朗读。甚至在录取新职员或伪官吏晋级时“惟神之道”也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总之，日伪政权采取种种高压强制的方式，将日本宗教信仰强加于中国东北民众头上。1942年7月，日伪政权为了进一步巩固殖民文化，计划在长春净月潭地区建立“建国元神”的永久圣地，但是后来随着日本战败而落空。

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活动的宗教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日本宗教本身具有明确地为本国政治利益服务的宗旨。他们的“海外开教”带着征服其它民族的顽固信念而来的，因此，日本布教使活动必然受本国、本民

族利益的制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必然自觉地配合侵略行为。第二，世界各民族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东北地区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吞，沦为殖民地。日本列强以战胜者自居，主宰中国东北民众，企图将自己的生活模式、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实行殖民地统治。第三，日本布教使中信仰不虔者居多，“吃教”、“借教”的现象极为普遍，其中帝国主义分子不在少数。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专事欺压中国民众，谋取私利，更增加日本宗教的侵略性。

#### 参考文献：

- [1]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 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3] (日伪)满洲铁道总局情报课．满洲宗教志[M]．满洲铁道社员会，1942.
- [4] (日伪)松尾为作．满洲宗教概观[M]．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1941.

责任编辑：张振兴

## The Japanese Religions in the Period of Japan's Occup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WANG Ruo-qian

(*Institute of Northeast Asia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Japanese religions started to spread i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Japan – Russia War and since then the Japanese religions became one of the main parts in Japanese invasion activities to China for about 50 years. Japanese religious spread to the Northeast of China accompanied with the Japanese military invasion included Tao, Buddhism, Christianity, Catholics, etc. Japanese religions could not assimilate with Chinese culture since they were with distinctive invasion character, they hurt Chinese people's religious feeling deeply by forcing people to change their own traditional religious beliefs. With the defeat of Japan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Japanese religions disappeared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completely. To understand the invasion nature of Japanese religions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s helpful for us to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onial culture of Northeast China in Japanese occupied period and to further reveal the invasion natur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Key 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Japanese religious; the system of Tao and deity; invasion nature